

梁 滨 久 著

方志学新论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方志文库丛书
(之八)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FANGZHIWENKU

梁滨久 著

方志学新论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梁滨久，1934年12月生，山东省黄县人。196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年再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地方志协会秘书长。近年来，发表方志论文近百篇，并任大型文献著作《中国地方志综览》副主编。

特约编辑：郑正西

方志学新论集

梁滨久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区党委凤凰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7.4印张 16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19-01312-4/K·63 定价：3.60元

方志文库出版说明

方志文库丛书之编辑始于1988年。该丛书由系列方志专著组成，由多家出版社不定期出版。至1989年底，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之一）、《中国地方志争鸣》（之二）、《新编方志点评》（之三）、《傅振伦方志文存》（之四）、《方志记事技巧》（之五）、

《全国各地修志培训班讲稿选编》（之六）、《方志体例古今谈》（之七）、《方志学新论集》（之八）、《陈元方方志文选》（之九）、《方志求是集》（之十）、《志稿修改与总纂》（之十一）、《重大运动如何入志》（之十二）。

方志文库学术顾问组由傅振伦、朱新夏、陈元方、邵文杰、王季平、林衍经、赵庚奇、黄德馨组成。主办人郑正西。

题滨久文集

我国有久远的修志传统。明清两代，可称极盛，而清朝成志六千余种，尤推大观，其与修志事业相辅而兴的理论研究也卓著成绩。前有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的述作，后有章学诚：《文史通义》诸篇的立论，对封建时代方志学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以降，修志工作虽略形中落，而理论研究著作尚不断问世，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黎锦熙：《方志今议》、王葆心：《方志学发微》及甘鹏云：《方志商》诸作，虽多承实斋志学绪余，然尚能有所发明，使方志学研究有所进展。

解放之初，百废待举，自难顾及修志，更遑论理论研究。五六十年代，倡导“群众修志”，鹊起鹊落，徒有积稿盈室之虚誉，终以缺乏理论指导而使记述、编纂难有成效，出版问世，实属寥寥。嗣经十年动乱，修志之议颇涉举逸树碑之嫌，以免遭谴责而更形默然。八十年代，诸业咸举，县编志事业随之大兴，省市区县风起云涌，数年以来，志成书问世者已逾四十种，每种无不字在百万上下，在学术领域中几成泱泱大国，而颇成缺憾者，则惟理论研究的不足。其初多以章学诚的理论为理论，于是立三书议，设志科说晓众口，流传甚广；继之汲汲探讨、阐述章氏理论，希冀略加装点以之作新编方志指针者也或有人在，而能陈言务去，奋力总

结概括修志实践以求建立马列主义方志学者不乏有志之士，其中佼佼者则有刘光禄、梁滨久……诸君。光禄勤奋好学，出而奔走各地，归而伏案疾书，积稿盈尺，颇著影响，不幸英年早谢。梁君滨久则新枝挺秀，成果丰硕，我历年读其文而憾未会一面，仅称文字之交。去岁，我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滨久也预其事，始略知滨久于八十年代之初负笈京华，学成即投身志界，傲立于北国冰城。读其文知其学识皆有根据，不唯书唯上，能独抒新见，又勤于著述，私衷窃喜方志学界后来者之能居上。今春，忽奉寄来书稿，嘱为作序。书稿乃滨久于多年来所撰八十篇文章中精选其中自定成集者。读滨久诸作，见其观点之鲜明，论述之新颖，实有可称。综诸文所及有历史遗产之研究，理论建设之呼吁，方志学科建立之倡导，志书编纂法之商榷以及新编方志之评议等等。虽尚未能建立完整的方志学新理论，但已能超脱于编撰、记述之外而立足于理论之探讨与研究，为编写新志寻求绳墨，为方志学新理论建设殚精竭思，空谷足音，不禁色喜，故徇其请而题其集。

来新夏

一九八九年元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题滨久文集·····	来新夏
应重视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	(3)
新中国的方志学研究·····	(7)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	(14)
应建立志学学科·····	(23)
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关键·····	(27)
史志关系立论的基础·····	(32)
史志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7)
方志和方志学的概念不应混淆·····	(43)
修志目的浅论·····	(47)
方志性质概念的含义·····	(50)
方志功能问题讨论的症结·····	(53)
修志事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56)
地方志发展的两种趋势·····	(61)
秉笔直书问题管见·····	(65)
方志长编之我见·····	(71)
地方志的总体设计·····	(74)
分期体志书初探·····	(78)
专志的分类分期问题·····	(84)
不能按哲学学科体系修志·····	(89)

地方志应以史为纲·····	(94)
关联 逻辑 科学性·····	(99)
小议“升格”·····	(103)
方志以类系时议·····	(106)
方志的以此系彼法·····	(112)
论详变略渐·····	(115)
小议志书载言·····	(120)
从门类的叙述谈到竖写·····	(123)
新省志体式析·····	(130)
省志专志概述编写的几个问题·····	(135)
解决省志内容交叉的理论与实践·····	(141)
城市志编纂的两种格局·····	(148)
城市志篇目中的宏观经济·····	(152)
谈县志中概述的作用和写法·····	(158)
综述漫笔·····	(162)
吸收地理科学成果,写好地理志·····	(166)
志书中物候资料的记载·····	(173)
借鉴《史记》,写好方志人物传·····	(180)
地方志书的纪年·····	(188)
试评《呼玛县志》·····	(193)
读《如东县志》(修订本)札记·····	(201)
很有特色的《渭南县志》·····	(208)
地方志编修机构发展的战略方向·····	(214)
章学诚方志学的出发点·····	(218)
章学诚关于人物志的论述·····	(223)

目 录

题滨久文集·····	来新夏
应重视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	(3)
新中国的方志学研究·····	(7)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	(14)
应建立志学学科·····	(23)
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关键·····	(27)
史志关系立论的基础·····	(32)
史志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7)
方志和方志学的概念不应混淆·····	(43)
修志目的浅论·····	(47)
方志性质概念的含义·····	(50)
方志功能问题讨论的症结·····	(53)
修志事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56)
地方志发展的两种趋势·····	(61)
秉笔直书问题管见·····	(65)
方志长编之我见·····	(71)
地方志的总体设计·····	(74)
分期体志书初探·····	(78)
专志的分类分期问题·····	(84)
不能按哲学学科体系修志·····	(89)

地方志应以史为纲·····	(94)
关联 逻辑 科学性·····	(99)
小议“升格”·····	(103)
方志以类系时议·····	(106)
方志的以此系彼法·····	(112)
论详变略渐·····	(115)
小议志书载言·····	(120)
从门类的叙述谈到竖写·····	(123)
新省志体式析·····	(130)
省志专志概述编写的几个问题·····	(135)
解决省志内容交叉的理论与实践·····	(141)
城市志编纂的两种格局·····	(148)
城市志篇目中的宏观经济·····	(152)
谈县志中概述的作用和写法·····	(158)
综述漫笔·····	(162)
吸收地理科学成果,写好地理志·····	(166)
志书中物候资料的记载·····	(173)
借鉴《史记》,写好方志人物传·····	(180)
地方志书的纪年·····	(188)
试评《呼玛县志》·····	(193)
读《如东县志》(修订本)札记·····	(201)
很有特色的《渭南县志》·····	(208)
地方志编修机构发展的战略方向·····	(214)
章学诚方志学的出发点·····	(218)
章学诚关于人物志的论述·····	(223)

应重视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

每一门科学，要获得正常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个处理好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方志学也不例外。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修志工作蓬勃发展。由于绝大多数修志工作者是在知识准备不足和经验缺乏的情况下上阵的，又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志书编纂任务，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加强方志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以解决编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急待解决的业务问题。把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摆在首要位置，这是方志学理论与方志编修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几年的方志学研究中，对方志编修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体例篇目、内容安排以及概述、大事记、地理志、专业志、人物志等部分的编写方法，语言文风与行文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学地指导着修志工作的开展。

但是，在修志工作者和方志学研究者中，存在着忽视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有一些同志认为，研究方志学的基础理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与当前修志关系不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基础理论研究可探寻方志事物深层的隐秘和根本的规律，开拓应用研究的视野，对应用研究起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就会

缺乏深度，就会流于浮泛，难以取得持久扎实的成果。

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资本论》的写作，终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一光辉著作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在1862年12月给库格曼的信中指出：他将以《资本论》的标题单独出版的“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科学事业时，历来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周恩来同志曾指出在科学规划中，一定要加一项基础理论的研究。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②做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方志学，自然也不应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加强方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从宏观上指导新志编纂的需要。在新志编纂中存在着大量的实际问题，如内容的把握和体例形式的安排以及语言表述等，这些看来是方志应用理论的问题，如果不从深层理论上探寻方志的本质以及有关方志功能、特征、编纂宗旨与目的等根本性的问题入手，就难以得到解决。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地方志的性质、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等方志学的基础理论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深刻地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是“科学文献”。这对地方志编修工作克服“政治化”倾向，力求严谨，保持一种科学、客观的态度，提高质量。将起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胡乔木同志要求“新的地方志

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我们不仅要门类设得比较合理，在门类的叙述上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多门类的相互关系。”这给我们指明了加强地方志科学性的根本方向。总之，只要理论深刻，就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加强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使方志学研究保持正确方向的需要。在现在方志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悲观论”。认为，在“信息时代”、“计算机时代”，方志是落伍者，已不能适应时代迅速发展的需要，将要被年鉴等所取代；二是“新创论”。认为，现在的新志编纂存在着新时代的内容与章学诚旧志体的矛盾，要表现新时代的内容，就要彻底否定旧志体，创立新体式。这种观点甚至要把方志的横排竖写也彻底否定。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不去认真分析旧志的糟粕体现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精华经批判后可以吸取，做为创新的基础和材料。他们对新志的编纂也缺乏辩证地分析，不看新志在内容上和编纂指导思想上与旧志相比有何本质上的变化，只凭形式上看似旧志就一概贬之为章学诚的旧体式。他们所谓创新不是从思想内容到体例形式上的全面创新，而只是“彻底否定”旧志体，在形式变化上做文章。这样，连地方志分类记事的传统体例形式也要抛弃，究竟能新创出什么东西来呢？存在上述两种倾向，究其根源，还是对方志学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没搞清楚。可见，加强方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澄清模糊认识，对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加强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需要。任何科学的任务都在于探求一定领域的规律，形成科学概念，建立理论体系。只有形成了理论体系，才标志着一门科学的成熟、方志学也是这样，它要在科学殿

堂里确立一席之地，并成熟起来，也必须形成一个有理论起点、有逻辑联系、经严密论证、受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而方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为其构筑骨架。章学诚的方志学之所以形成了体系，就在于它有“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方志性质说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石，而其他各种观点和主张都可以从这一理论基础得到说明。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对方志学理论大厦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而方志学的应用研究，是方志学理论大树上的枝叶，这方面的大量深入研究可以使方志学理论之树枝叶繁茂，但终究不是使大树挺拔于世的树干。

加强方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重要的，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方志学理论研究者纯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地总结新志编纂的实际经验，批判地审度一切方志学思想理论遗产，并熟悉方志编纂的历史与现状。它还需要全国方志学研究力量的通力合作和每个研究者的勤奋努力。但是，只要高度重视起来，认真开展方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就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注

① 《资本论书信集》第1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66页

新中国的方志学研究

新中国的方志学研究，是在对旧方志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阐明新中国的方志学研究，首先须回顾一下旧方志学。

地方志从周秦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方志产生之日起，也就孕育了方志学的思想。因为要编纂一部地方志，必然有编纂目的，以及为达此目的而采用的一定的编纂体例与方法。随着方志编纂事业的发展，经验和思想资料的逐步积累，方志学思想也日趋成熟。有人对修志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也就产生了方志学理论。但最初的理论形态是粗糙的、片断零碎的，很不系统，也很不完善的。

到了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石首县志》、《湖北通志》等志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并把自己对史学方面的理论创见用之于编修方志，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和研究前人方志学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和《州县请立志科议》等论著，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其主要观点有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性质说，方志“为国史取裁”和“裨风教”、“辅政教”的功用说，“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

传)的体例说。此外,还有方志辨体(省、府、州、县志各有所重,内容不得混杂,不可任意分合)、州县设立志科(专门收集保管档案等修志资料的机构)等。

民国时期在方志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产生了一批研究地方志体例、源流、编纂方法的论文和专著。例如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对清代的方志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李泰棻的《方志学》、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对方志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探究;此外还有瞿宣颖的《志例丛话》、《方志考稿》甲集和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这些论著要求体现现代科学精神,注重民生实用,体现了新时代的折光。这个时期的志家一般都强调详载民事和经济资料,并要求采用科学方法修志。但在某些基础理论上,仍然祖述章氏,如师承章氏的方志为史说。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尚未突破旧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仍归旧方志学范畴。

新中国的方志学理论研究工作,是随着旧志整理和新志编纂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及新的方志编纂事业,使新方志学研究面临一个新的基础。但是,对旧方志学的批判继承是建立新方志学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在普遍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之前,学术界对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旧方志学和一些旧地方志书进行了评介和研究,对旧志史料价值的阐述和利用也在积极进行。仅类编的旧志资料就有《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国古今铜矿录》、《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等。其间,也有如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和方志学家傅振伦等提出过整理旧方志

与编修新方志的建议，在建议中还设想出新志的内容、体例篇目和编写方法，但这毕竟只是设想，具有多大的可行性，需要修志实践的检验。金毓黻《普修新方志的拟议》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956年第5期上，所拟新方志篇目分大事、疆域、建置、地质气象、山水、自然灾害、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政治组织、教育、文化、民族、宗教、人物、古迹等各类。傅振伦的《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载《新建设》1956年第6期。所拟篇目的第一、二编是疆域沿革和自然环境、自然富源。第三、四编是按原始社会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分写各方面史事。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篇目。

1958年前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批“新志”，反映一地真实面貌的质量很差。许多县志书写成了政治形势的教科书、政策的宣传品。特别是记述“大跃进”时期的“辉煌成果”，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所以，处处贴标签、事事作渲染的现象比较严重，政治宣传色彩非常浓厚。广西《苍梧县志》记其特产“六堡茶”后写：“因此，六堡茶颇受群众喜爱，从内心发出幸福喜悦的歌声：采茶姑娘遍山坡，一片茶牙一片歌，歌唱茶叶大丰收，歌唱茶农幸福多。”广西《忻城县志》记地理，最后还要写上一段“结束语”：“总之，忻城每一寸土地都是可爱的。这里有丰富的宝藏，有说不尽的希望。只要忻城县人民听党的话，下决心开辟与建设，这块土地，不久将来，将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花园。”此类大话、空话比比皆是。此外，还有许多浮夸失实之处。很多县志或志稿都记了1959年工农业生产放卫星的情况，有亩产粮食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有粮食总产量一年翻几番的，有一夜之间县内就办起二、三十万个厂